

李大钊与《晨报》『劳动节纪念』专号

□ 郑学富



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的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发出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发在专号第二条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是李大钊（1889—1927年）的字。他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庆祝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李大钊充满希望地预见：“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日是马克思的誕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誕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

专号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1885—1968年），原名高水浩，别名涵庐、梦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读书好学，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

高一涵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之资格，社会生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机会，使之归于平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虽然挂了块“民国”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实在没有解决劳动问题。他说要想实现平等，“就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因势利导，从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机会，才有平稳进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的贫富不均，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要废止这种社会制度，“是要把全国所有的田地、工场、矿山机械、铁路船舶等一切生产要具，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营”。作者描绘理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或种田，或做工，或教书，或当记者，或当演员，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作者指出，中国“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夫、平民的饭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们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受，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特别国情。作者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长久吗？可以相安吗？”作者指出：“现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来，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脑筋的人，大家出来研究研究，早点想个法儿，免得河翻水溢，措手不及呀。”

《晨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曾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作出特殊贡献。

（摘自2021年5月6日《人民政协报》）

日晒夜露石为伴

江苏省句容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洪天诚

洪天诚，1921—1998年，江苏省句容县人。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新四军青年工作队。1945年6月任镇句县委书记。1946年10月，任镇句工委副书记。1947年，镇句工委改为茅山工委，洪天诚任茅山工委副书记。1949年4月句容解放后，洪天诚被任命为句容

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长，1951年9月调任上海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1958—1965年，任二机部（即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后到浙江工作，先后任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党委书记。1993年离休，1998年病逝。



（一）

车子出了南京，行驶40公里便进入了句容。坐拥道教圣地——茅山和佛教圣地——宝华山两个“4A”级风景旅游区，句容这个南京“东南门户”山明水秀，无愧于“南京新东郊、金陵御花园”之美誉。

我们此行所要追寻的对象是洪天诚，他曾于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担任句容县委书记。

为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情况，在句容市委宣传部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句容市史志办公室。说明来意后，史志办相关领导特意为我们请来了已经退休的原史志办主任朱延生。

据朱延生介绍，洪天诚是句容本地人，很早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6月开始，在镇句县工作，曾任镇句县委书记。镇句县是现在镇句公路（镇江—句容）以北、宁句公路（南京—句容）以东的地区，如今已经不存在“镇句”这个行政区域。1949年4月句容解放后，洪天诚被任命为句容县委书记、县长。对于洪天诚在句容工作期间的情况，朱延生尽其所知，为我们作了介绍。

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南京、镇江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警察争相逃命。4月23日下午3点多，人民解放军第34军先锋营顺利进城，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句容解放。24日，为控制解放后句容城的局

势，洪天诚便服简从先行入城。第二天，新组建的句容县委县政府也进驻句容城内，洪天诚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接管句容的多为南下干部，主要来自山东。洪天诚作为本地人，开展工作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他的带领下，县委县政府顺利地完成了对政府机关和所属机构、军警、厂矿、学校、医院等单位的接管，之后，洪天诚开始组织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并积极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们想找到洪天诚的后代或亲属，但多方打听得知，洪天诚自1951年离开句容后，先后在上海、浙江工作，晚年一直生活在浙江直至病逝。没有线索，我们无法与他的家属取得联系。然而，记者在翻阅《句容市军事志》《句容革命斗争史》时，惊喜地发现了一些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洪天诚事迹的零星记载。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整理后的不多的文字感受到洪天诚这位老县委书记的风采。

（二）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为了争取和平建国，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撤出苏南解放区。当时，洪天诚任镇句县委书记，镇句县委亦在北撤范围之列。但是，为保障南北交通安全畅通，掩护江南部队

和党政机关，管辖镇句的苏中五地委布置镇句县北撤晚于茅山地区各县，因此直到10月下旬，苏南撤退结束，洪天诚才收到北撤的通知，时间极其紧迫。

洪天诚立即召集县、区领导干部开会，布置北撤。然而，布置工作尚未完，国民党57师170团便已经占领镇句县中心区和交通要道，开始搜捕中共军政工作人员，形势十分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宝华、句容7区有一些应北撤人员还没有得到北撤的通知。洪天诚立即派人与他们联系，让他们分散经上海北撤至兴化。洪天诚则迅速带领干部和武装部队先撤往丹北，然后再北撤。

1946年10月，华中分局成立华中地委，下属镇江、句容等4个工委，洪天诚任镇句工委副书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地委决定渡江南下坚持斗争。

1947年1月，洪天诚率领一行80多人（内有30多名武装人员）到达镇江地区的句容境内开展活动。当

“实事求是”的石刻记忆

□ 李睿宸



刻遭到破坏，便在离开前将石刻埋入地下。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在原中央党校建校，从地下挖出了这4块石刻，并将其交给延安革命纪

念馆保管。如今，这4块石刻静静矗立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诉说着这段往事。

（摘自2021年2月5日《光明日报》）



以服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

□ 石 慧

做的。

王杰从小事做起，处处以身作则，最痛恨言行不一，对所谓“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放松。他关心战友，视战友如兄弟。长途行军，自己脚上起了水泡，浑身酸痛，但一放下背包，先给其他战友打水烧水，帮助炊事班生火切菜，然后才休息。王杰勤奋工作，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他在部队里年年是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当了班长，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

能手。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当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他纵身一跃，毅然扑向炸药包，用身体压住了炸点，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炸药包爆炸后，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安然无恙，王杰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3岁，光荣牺牲。他用葱郁的青春和鲜活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豪迈誓言：“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根据王杰生前愿望，所在部队

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题了词。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

1965年11月9日，《解放军报》以“一心为革命”为题，刊登了王杰的日记，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1968年，为了缅怀英雄，王杰成长的山东省金乡县花鼓村改名为“王杰村”，并在村里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摘自2021年第5期《党建》）